

欧洲共产主义

它在意大利等国
的渊源及其前途

新华出版社

欧洲共产主义

——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

乔·乌尔班 主编

石益仁 译

新华出版社

欧洲共产主义
——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

乔·乌尔班 主编
石 益 仁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6 3/4 印张 247,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1203.004 定价：1.60 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1、十多年来，西欧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近几年，这股势力在西欧的政治生活中已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特别是意共，作为意大利的第二大党极力想挤进政府，参与执政，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

欧洲共产主义标榜“民主”、实行“有人情面孔的社会主义”，鼓吹通过议会道路上台执政，主张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独立自主，反对苏联共产党的发号施令和苏联出兵捷克等侵略扩张的某些做法。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刚一问世就遭到苏修的攻击。

在理论上，法共、意共先后在党代会上作出决定，正式取消党章中“无产

阶级专政”的提法，鼓吹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到底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它的历史由来如何？它同法西斯主义及其以后出现的反法西斯运动有什么关系？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欧取得的一些进展对东欧会产生什么影响？欧洲共产主义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持什么态度？如果苏美发生公开冲突，欧洲共产主义者会站在哪一边？书中对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必须指出，书中有多处对列宁、列宁主义和斯大林进行了攻击和诬蔑。我们相信，读者是能够批判地看待这些内容的。

2、本书由乔·乌尔班主编，以对话形式写成，曾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由“自由欧洲电台”分期广播。第一篇阿斯卡拉特的《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一文是专为此书写的。

3、书中引用的革命导师的话均按本书原文直译。

撰稿人简介

安德烈·阿马利里克：俄国第一批最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他的著作有《苏联会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和《违反本意的西伯利亚之行》。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西班牙共产党主要发言人。该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书记、党的理论刊物《我们的旗帜》主编。

路易吉·巴齐尼：前意大利自由党众议院议员；著作有《意大利人》和《啊，美国！》等。

让·爱伦斯坦：法国共产党马克思研究中心副主任，《苏联史》、《斯大林统治史》和《共产党》等作品的作者。他是法国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派的主要发言人。

伦齐奥·德费利切：罗马大学历史教授。《墨索里尼：革命者》、《墨索里尼：元首》和《墨索里尼：法西斯分子》（一、二卷）等著作的作者。

法比奥·穆西：意大利共产党文化部《再生》周刊主编。

卢乔·伦巴多·拉迪切：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要成员，罗马大学数学教授。他的著作很多，其中一本是关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平。

罗萨里奥·罗梅奥：现代史教授、罗马大学现代史学院院长。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意大利大工业简史》、《现代史的一些问题和阶段》和《加富尔和他的时代》（一、二卷）。

多梅尼科·塞特布里尼：比萨大学工人运动史教授、《意大利政治中的教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两个设想》、《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迷宫》等书的作者。

巴托洛梅奥·索杰：权威杂志《天主教文明》主编、教皇保罗六世关于共产主义事务的亲密顾问。他的著作包括《资本主义、阶级选择、社会主义》和《福音传播和人类进步》。

阿尔蒂埃罗·斯皮内利：意大利众议院议员、前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七年）。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他于一九二七

年至一九四三年被关进监狱。

乌尔班：现代史作家，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级副研究员和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员。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一九五六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任自由欧洲电台对大学广播部主任。作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国际关系学院高级副研究员，他创办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季刊。他现任自由欧洲电台顾问，著作有《十九天》（一九五七年出版）、《中苏冲突》（与利奥波德·拉贝兹合写，一九六五年出版）、《缓和》（一九七六年出版）等。

前 言

人们对历史有很多误解，其原因是人们思考问题往往简单化。在苏联的制度中到底是俄国的色彩浓于共产主义色彩呢，还是共产主义色彩浓于俄国色彩？从苏联的行事方式看，它是否很象是一种事业，而不怎么象是一个国家？新闻记者是很容易对一种复杂的现实作这样简单地描述的。我们在这次座谈会上，设法避免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提问题，而是要对“欧洲共产主义”作深入的探讨，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同实际政治的要求这两者互相制约和互为因果的关键地方找出来。

探讨的结果必然是令人不安的，这不是因为我们会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苏联封锁消息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拉丁系欧洲国家用以欺骗本国选民的一种手段；而是因为欧洲共产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理论，它没有建立任何中心，也没有（到目前为止）能够提供任何可以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样板；尽管如此，它却遭

到苏联的责难，好象上述所有的事情它都已经做了似的。

象目前这种各地大同小异的欧洲共产主义，当然可以因不合国情而拒绝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除此以外，每个欧洲共产主义者都坚持自己的信仰，制定自己的理论。只有西班牙的欧洲共产主义已经制度化，但是，就是在那里，反对制度化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声音也是很强烈的。而在其他所有地方，欧洲共产主义者都采取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折衷态度，凡是适合他们的情况的党史和意识形态，他们就采用，凡是对他们的情况不再有任何帮助的，他们就拒绝接受。如此严重的宗派主义对莫斯科的权威的危害性是否比它对欧洲共产主义本身的前途的危害性更大，这是一个正在争论的问题。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还处于幼年时期，偶像破坏者们有点向过去的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过去）进行挑战的忘乎所以的味道。

这些就是我们对七十年代末期欧洲共产主义的状况的直接印象。但是，如果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人们就会对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共产主义运动能否站得住脚产生怀疑。马克思主义，不

管怎样解释，它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实行专政（尽管马克思发表了意思与此相反的声明），就需要有一个党。但是，一个党，如果它不实行严格的纪律，从而导致一个统治集团的专政、最后导致一个人的专政，那么这个党就无法有效地实行专政。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又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这个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这产生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声明：“共产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而欧洲共产主义者则试图按相反的顺序解开这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紧身衣。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的影响下，他们第一次把斯大林主义排除出共产主义运动。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在下面这样一个在理论上极其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斯大林主义究竟是一种赘瘤呢，还是一种系统上的失调。接着，一些比较直言不讳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例如让·埃莱因施泰因以及在他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中的知识界领导人和更早一些时候的吉拉斯（前译德热拉斯）），抛弃了（虽然

并不总是很明显的)列宁主义的某些方面,后来抛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完整的部分,说这些是只有在俄国落后的环境中才会有的歪曲现象。最近一些时候,可以通过选举取得胜利这种诱惑力量,使得法国共产党(显然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正式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自一九四七年以来,这种专政已被非正式地逐渐放弃了,同时被抛弃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这一点还没有得到承认。

不管采取这些行动是否仅仅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其政治含义都是重大的,因为这些行动暴露了贯穿于欧洲共产主义这种新事物的基础的内部断层,即非斯大林化导致非列宁化,最后不可避免地会抛弃马克思主义。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只要真正存在着欧洲共产主义(据乔治·阿门多拉说,并不存在欧洲共产主义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种容易起变化的东西,它最后要末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要末又变成某种列宁主义。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它的性质就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了,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它就不再是欧洲共产主义了。

这是否把这个矛盾说得太绝对化了?最近,

西欧各国的选举情况表明，人们投共产党人的票，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抗议性行动，而不是为了让共产党执政，看来这种情况必定会继续下去。因此，看来放弃共产主义历史的神话，并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欧洲化，这些是否有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得到抗议性选票，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凡是社会民主党人不主张的东西，共产党人都主张，如：保持完全一致的世界观，对现存秩序持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使用独裁性决策办法；有坚定不移的指导方针，并具有实行这些方针的意志。

但是，象下面这样一个党能满足人们这些希望吗？这个党对“伟大的十月”的神话产生了怀疑；不可挽回地损害了一贯正确、事事成功和一贯强有力的苏联社会的形象，使人们所怀有的这种希望遭到破灭：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具有献身精神的、不屈不挠的人们创建了一种优越的制度（虽然没有一个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希望看到他的后院出现这种制度，但是可以站在远处赞赏它，特别是把它抬出来作为对他的统治者的一种威胁）。共产党之所以有吸引力，其秘密就是它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它的温和做法。如果除去极端

主义，共产党就会面临被比它更左的党派所压倒这样一种严峻的前景。

乔治·马歇一九七八年四月向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时坚持说，不论是搞欧洲共产主义还是恢复正统，“都会导致法国共产党的灭亡”，然而他当时未能认识到上述那一点。欧洲共产主义会导致法国共产党的灭亡，而列宁主义则不会，就象它过去确实并没有带来这种后果一样。

凡是激进主义得到选民支持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就强大，因为，不管其做法是对是错，共产党是拥护列宁主义的。凡是激进主义得不到选民的支持，而得到支持的却是一个有生存能力的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就获得成功。但是，对被冲淡了的共产主义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成功的余地。

所有这一切，欧洲共产主义者都不予承认。他们否认他们正在漂向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当然也否认这样的说法：只要实行自我保护（如果此外别无他法的话），就可以使他们回到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的确，人们嘲笑苏联那种列宁主义是有“损于板样形象的社会主义”。正象让·埃

莱因施泰因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在《世界报》上所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十分有把握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从苏联的情况知道什么东西不是社会主义。这与埃莱因施泰因在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后痛哭流涕（这是他告诉我们的）的那些日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欧洲共产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有疑心，其报应是，社会党人则对欧洲共产主义怀有疑心，尽管情况不是千篇一律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极其清醒地意识到，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正在推动他们朝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他们讨厌这种前途，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选举策略方面的原因。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一次讲演中说：“‘欧洲共产主义’正在变得受人尊重了。”

他说：“社会党人应该避开‘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我们不应该让它流传……我拒绝接受这个词，因为我不希望使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欧洲，有一个连贯的实体。我拒绝接受这个词，还因为它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放松了警惕。不久，就会有人要我们把英国共产党

同欧洲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现在的危险是，英国工党将会慢慢地背离它目前这种明确反对和一贯敌视英国共产党的方针。就会有人首先要我们容忍共产党的存在，然后要我们同它建立联系，第三步就要我们在左派的大旗之下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在欧洲共产主义这种崇尚空谈的气氛中拥抱着在一起。我们必须进行抵抗，因为，这种情况将意味着工党在选举中会遭到失败。”

苏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否定，在措辞上不怎么明显，但意思并不含糊。这表明存在着这种担心：苏联党在它与中国以及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其他派别作斗争方面的权威将进一步受到削弱，从而带来东欧的稳定没有保障这种无法估量的后果，特别是，如果欧洲共产主义者继续处于反对党地位，可以自由地批评苏联制度，而不象处于当权执政的地位时有所顾虑的话，情况更是如此。苏联领导人很精明，他们能够认识到，凡是有可能建立一种有着人情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地方，有着俄国面孔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使欧洲共产主义异端受到咒骂的惯用办法就是坚持这一点：列宁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留下来的经验，是用之四海

而皆准的“法则”，各国共产党可以对这些法则作适当的修改，但是它们不能从结构上进行更改或无视这些法则的存在。

这是一种无力的要求，的确是一种虚伪的说法。西方各国共产党所表白的共产主义至少得到了列宁本人的默认，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国家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欧洲共产主义者说，正是俄国这个榜样的落后性使得无法在西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直到马克思主义不再为斯拉夫民族所糟蹋，而重新回到它的西方基点上来。苏联对它被降到“落后国家”的地位——即使这是以列宁的名义干的——这种前景感到不快，对此，我们用不着吃惊。苏联还由此反过来指责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搞的一种阴谋”，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正在对苏联发动一场“十字军式”的进攻，企图使共产主义运动“处于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